

后疫情时代的逆全球化与国际经济秩序探索

佟家栋,刘程

(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天津 300071)

摘要:针对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秩序发生的新变化,对历史时期两波经济全球化、逆全球化及发展方向进行分析,在论证WTO改革的基础上,对疫情冲击与国际经济秩序的调整与改革进行了研究。研究认为,经济全球化并不能使一个国家的生产要素所有者平均受益,反而会使收入在不同要素所有者之间出现两极分化,在两次全球化的兴衰周期中,收入不平等的周期性特征在多个国家出现;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性冲击,增加了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在逆全球化的紧迫压力下,各国都希望将WTO的改革落实在具体的行动、相关条款的修订和增加的进程中,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应积极参加全球价值链的整体循环,也要营建以中国产业、中国技术为主导的区域分工体系,还应坚持深化经济改革,建立高水平开放的多层次平台,成为国际经济秩序的积极倡导者和模范的执行者。

关键词:后疫情时代;逆全球化;世界贸易组织;国际经济秩序;经济全球化;全球价值链;区域分工体系;中国;美国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20)04-0033-08

Exploration on the reverse glob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in the post-COVID-19 era

TONG Jiadong, LIU Cheng

(School of Economic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On account of the new changes occurred in the global economic order in the post-COVID-19 er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wo wave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reverse globalization in history as well as their development trends, and studies the impact of the COVID-19 and the adjustment and reform

收稿日期:2020-05-24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7JJD790013)

作者简介:佟家栋(1959-),男,天津市人,讲席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经济学博士。

通讯作者:刘程(1978-),男,山东青岛人,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based on the demonstration of the WTO reform.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s not able to benefit the owners of production factors in a country equally, but will instead polarize income among different owner groups; the periodic feature of income inequality occurred in multiple countries during the rise and fall cycles of the two waves of globalization. As the extensive impact of the COVID-19 increased the uncertainty of global economy, and under the urgency of reverse globalization, all countries wish to implement the WTO reform in terms of specific actions, the revision and addition of relevant clauses etc. in order to drive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China shoul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entire cycle of global value chain, build the regional division of labor system dominated by Chinese industries and Chinese technology, adhere to the intensification of economic reform, establish an open and high-level platform with multiple grades, and become an active advoca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and the enforcer of exemplary deeds.

Key words: post-COVID-19 era; reverse globalization; WTO;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economic globalization; global value chain; regional division of labor system; China; U. S.

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的蔓延性冲击,既使世界经济进入断崖式衰退,又威胁着后疫情时代国际经济秩序,甚至加重经济逆全球化的态势。然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可能会以顽强的调整期模式表现出来,进而推动全球经济秩序在改革与调整的路上继续前行。

一、历史上的两波经济全球化、逆全球化及发展方向

经济学家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经济全球化是大宗商品贸易在主要经济大陆同一商品价格的趋同。以该标准为依据,第一波经济全球化自 1820 年开始,到 1913 年结束。这期间,国际贸易占全球 GDP 的比重最高时达到 30%。欧亚大陆与北美之间繁荣的大宗商品交易和统一市场的形成,使得欧洲旧大陆与北美新大陆间同一商品的价格差异压缩至 30% 左右。第二次全球化发端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世界经济恢复期,结束于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实体经济的衰退。这两次经济全球化的中断期,第一波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为恢复经济普遍实施的以保护本国市场为特征的保护主义贸易政策,以及由此引起的 1929 年到 1933 年的大危机,并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打断第二波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是 2008 年金融

危机及其经济衰退,进而是全球经济长达 12 年的低速增长。以贸易开放度为指针的全球化历史进程具体情况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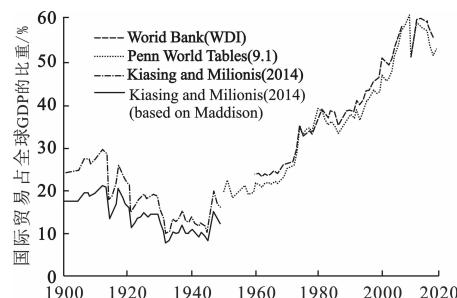


图 1 两次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历史演变^①

经济全球化首先引起商品市场价格的变化。自由贸易必然带来贸易品价格发生变化,过去在一个国家因生产要素比较稀缺,要素价格高,生产成本较高的商品会因为进口而变得便宜了;而过去价格比较便宜的商品会因为出口而在国内市场变得比较贵了。相应地,生产这类商品使用的生产要素也会变得便宜起来。贸易不仅使商品的价格在各个国家趋向均等,也使生产要素的价格趋向均等。

^① 资料来源:贸易开放度数据分别来自 Klasing and Milionis (2014) (基于 Maddison) (%), Estevadeordal, Frantz and Taylor (2003) (上限) (%), Klasing and Milionis (2014) (%) ,Estevadeordal, Frantz and Taylor (2003) (下限) (%). 全球实际 GDP 数据来自 World Bank (WDI) (%) 以及 Penn World Tables (9.1) (%)。

因此,要素价格均等化成为商品贸易发展的延伸性影响,以致影响到不同要素所有者的收入水平。因此,经济全球化过程不仅能够使一些生产要素的收入水平上升,还会使另外一些生产要素的收入水平下降。

第二波经济全球化不仅表现为国际贸易的巨大发展,还表现为生产的全球化、资本的全球化和投融资的全球化。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生产全球化过程是这样展开的:它将生产过程按照各国要素禀赋和市场禀赋的差异,依据产品生产环节,将生产产品的全过程分割性布局在全球各个国家或地区,形成全球价值链或生产链。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成本,为投资者创造了巨大的利润获取机会和空间。加上金融的全球化,资本成为在全球范围内高度流动的生产要素,并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取了最大限度的利润。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另外一种生产要素——劳动力的流动性比较差。因此,伴随资本在全球的高度流动,生产就业机会从一个国家或地区移向另外一个国家或地区。伴随跨国公司生产工厂的转出,母国劳动力就业和获取稳定工作收入的机会也逐步减少。因此,经济全球化并没有使倡导和引领经济全球化的国家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平均受益,至少是同方向受益,反而出现了收入在不同要素所有者集团之间的两极分化。

这种分化在《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的数据中得到了充分印证(图 2)。图 2 显示,过去 40 年间,美国社会最富裕的前 1% 阶层,其财富占全社会财富的比重从 1978 年的 21%,一路攀升至 2012 年的 39%。而所谓“中产阶级”(分位数介于 10% ~ 40% 之间),其总财富占比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到达顶峰(37%)以后便处于逐年下降的趋势,至 2012 年已跌至 27%。而占美国社会一半人口(分位数处于后 50%)的中下阶层,其财富占全社会的比重近乎为 0^①。与财富分化同步出现的还有收入的分化。图 3 显示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至今,美国各收入阶层占比的历史变化。高收入人群(前 1%) 的收入比重在第一次全球化的尾

声达到 21% 的峰值,在大萧条和二战后的经济复苏期,持续下降了约 50 年,最低跌至 1975 年的 11%。之后随着第二次全球化浪潮在近 40 年中持续攀升,并在 2012 年回到了大萧条前 21% 的峰值。而低收入阶层则与此趋势形成对比鲜明的镜像关系。占社会一半人口的中低收入者(分位数处于后 50%)的收入比重自二战后持续攀升,并在 1970 年达到峰值的 21%,其后便一路持续下跌,2014 年已跌至 12%。这种社会收入分布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高涨和衰退交替更迭的周期性现象并非美国所特有。更长期的数据显示,在两次全球化的兴衰周期中,收入不平等的周期特征在世界很多国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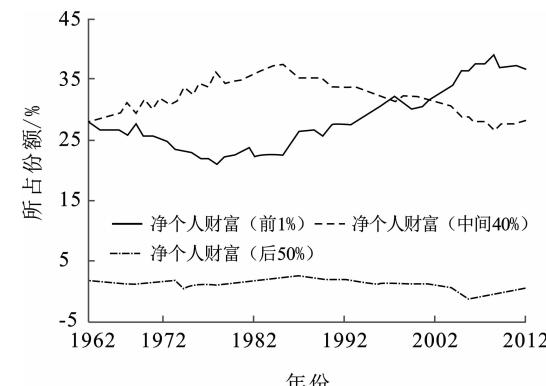


图 2 美国社会财富分布的两极分化(1962~2012 年)^②

如果这种收入分配在各发达国家的出现只是暂时的现象,并且政府可以通过收入的再分配加以重新分配,或帮助失业者在经过学习或培训之后在新兴产业重新找到工作,那么,由经济全球化所导致的收入分配不均等可能通过再分配机制调整好,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经济利益受损失的集团就不会反对国际贸易,反对全球化。但是,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E·斯蒂格里茨所指出的“即使一个国家整体而言已变得富裕,某些人的生活却仍会不如以前。成功者应当补偿失败者,但他

① 事实上在 2008~2013 年的 6 年中,美国后 50% 人口的净财富占比始终为负值,即整体处于净负债状态。

② 数据来源于世界不平等数据库: 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 (WID.world) 2020。

③ 数据来源于世界不平等数据库: 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 (WID.world) 2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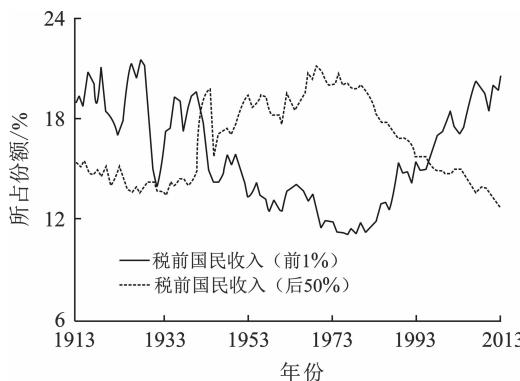


图3 美国社会收入分布的两极分化(1913~2013年)^③

们往往不会这么做。当失败者的数量非常多时——正如美国的状况——而且这些人来自本不富裕的群体,他们便会消极看待贸易。”^[1]

因此,逆全球化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趋向于强化,进而促成了西方普遍的贸易,乃至国际经济保护主义浪潮的兴起。唐纳德·特朗普就是在高调表示他全力支持逆全球化的背景下当选美国总统,并在执政后,相继对俄罗斯、伊朗、欧盟、日本等西方国家以贸易惩罚相威胁,迫使这些国家开放市场,与中国开启了贸易摩擦。美国相继退出TPP,重新谈判TTIP,重新谈判美韩自由贸易协定,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等。以“美国优先”的理念,以“对等贸易”为谈判准则,迫使各国开放市场,进口美国产品,不顾国际贸易准则和公平竞争的国际贸易规则。甚至扬言,如果世界贸易组织不进行深入的改革,美国将要退出。这表明,美国不再履行“国际贸易秩序维护者”的职责,也不承担“国际秩序维护者和引领者”的义务。

由经济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演进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在市场经济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过程总是被其曾经的倡导者所反对,所逆转。美国转向“美国优先”的战略表明,不管在经济全球化还是逆全球化的选择中,美国都选择了单边主义的利益。

但是,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追求高效率生产、高效率交换和要素高效使用,以追求最大限度利润为目标的资本所有者不可能放弃这样一个目标。因而,经济的全球化过程会以新的方式加以调

整,并以适合大众的方式加以贯彻。具体表现为,美国退出后,其他11个成员在日本的带领下,继续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的谈判,在2017年底签订了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继续推动该地区高水平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以便带动地区经济发展。欧盟在英国脱欧的谈判进程中和签订协议后,都表现出坚决维护欧洲一体化进一步发展和升级的强烈意愿,进而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如开始讨论欧洲一体化需要向财政政策协调的方向发展问题,甚至讨论欧洲国防军队的建设问题。一些学者认为,欧洲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够应对逆全球化的冲击。

中国自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自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对内坚持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改革,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同时注意协调“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引进外资,调动了资源的有效配置,推动了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改革开放40多年经济增长速度年平均达到9.8%,可以说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之一。因此,中国支持经济全球化,反对逆全球化、国际经济保护主义是坚定不移的。

因此能够看到,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希望通过相对自由的贸易环境,通过各国相互往来关系的建立、维持和深化,促进各自的经济发展。但是,发达国家也明确提出,世界贸易组织或国际贸易秩序的改革,要考虑到发达国家经济贸易、乃至投资利益的诉求。

二、WTO改革的迫切需要

伴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和产业不断升级,以有形产品制造与加工为标志的制成品生产比较优势,从发达国家逐步转向发展中国家。统计资料表明,

^① 注:数据来源于世界不平等数据库: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 (WID.world) 2020。各国数据均为税前收入前1%人群的收入占比。世界平均数据由37个有可得数据的国家和地区计算得到。

2018 年全球制成品贸易中,发达国家已经降低到 48%,而发展中国家在制成品贸易中的比重已经提高到 49%。一方面,伴随产业结构的升级,发达国家主要的贸易优势已经从制成品生产,逐步转向服务贸易的发展和现代服务价值的输出。另一方面,与此相对应,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已经逐步摆脱单纯的初级产品和原材料的出口,升级到劳动密集型制成品或中级制成品层次。由此,世界贸易组织在建立初期所倡导和制定的维护自由贸易秩序的规则,由主要保护发达国家的出口贸易品,转变为也保护发展中国家出口的贸易品。而发达国家高技术含量制成品出口所涉及的知识产权保护,发达国家因产业链全球化产生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问题,发达国家所关注的劳动标准和福利问题等等,在已有的贸易规则中没有充分体现,或因为发展中国家难以达到这些高标准而未能写入协定,或干脆停留在议而不决的过程中。客观而言,世界贸易组织要长期存在与发展,必须照顾到所有成员方的利益,如果一些成员方在世界贸易组织的运行中,受到的损害大于从中的受益,那么,对这些成员而言,要么退出,要么调整或者改革制度。美国就以退出世界贸易组织相威胁,要求 WTO 改革。

我们看到,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仍然可以从现行的贸易规则中获取贸易环境比较自由的利益,但也提出了改革的诉求。改革的主要领域包括,第一,关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发达国家强调,知识产权的保护是贸易,特别是高技术含量产品、服务贸易、产品贸易所必需的,否则难以保障发达国家产品和服务出口的利益。第二,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地位问题。美国提出,一些大国,比如中国 GDP 的绝对值已经位居世界第二,应该从发展中国家的行列中剔除。而发展中国家认为,确定发展中国家的依据不是人口的多少和经济体量的大小,否则诸如印度、马来西亚等都不是发展中国家了。第三,与贸易有关的投资问题。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跨国公司的贸易与投资基本融为一体,很难分清哪些是贸易哪些是投资,且东道国的投资规制很难与发达国家保持一致,

自然影响发达国家贸易和投资的安全。发达国家要求,在投资领域需要建立超越国家主权的立法或规制,保护跨国公司的经济利益。第四,关于竞争中性问题。自澳大利亚 1996 年提出竞争中性原则以来,该原则就成为约束各国政府秉承市场经济原则,不能偏向国有企业,避免国有企业获得来自政府方面偏袒的重要原则。由于在世界贸易组织中,多数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以投票的方式决定改革是非常难以落实的。因此,如果不能顺利改革,WTO 很可能陷入停滞或停摆,发达国家可能另起炉灶,寻求其他方式推动改革。奥巴马政府就曾经探讨,在 TPP 和 TTIP 中探索以高层次贸易自由和投资自由推动国际经济贸易秩序的改革,期望以示范的方式,逐步施加压力,迫使世界贸易组织走上改革之路。

中国学者认为,WTO 改革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到贸易结构、贸易模式、贸易与知识产权保护、与贸易有关的投资问题等现代国际贸易所涵盖的国家利益保护,以及在此运行中的公平竞争问题。关于发展中国家,一方面,我们承认发展中国家的多样化、多发展水平、多发展阶段问题,因此,对发展中国家应该有更加详细的分类;另一方面,我们坚持对发展中国家的差别待遇或特殊优惠,以便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摆脱由产业结构落后带来的贫穷。

应该说,在逆全球化的紧迫压力下,各国都希望聚焦力量,将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落实在具体的行动、相关条款的修订和增加的进程中,以便持续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前,各方正在就有关 WTO 改革形成基本共识。这些共识是:(1) 维护经济的发展与增长,摆脱 2008 年以来经济发展的低迷状态,珍惜好不容易复苏的全球经济态势;(2) 用区域一体化秩序暂时替代国际经济秩序的缺位,亚太 11 国继续维护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CPTPP),以维护地区的贸易自由化;(3) 欧盟希望强化地区之间的合作,以便坚定成员国强化经济一体化的信心;(4) 中国希望通过强化双边或多国自由贸易区协

议,保持局部或区域的贸易与经济合作(包括“一带一路”);(5)世界贸易组织各主要国家表示,在深化改革的前提下,维护多边贸易组织的正常运行,没有迹象表明美国要退出WTO;(6)世界银行强调贸易自由化,维持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默许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

三、疫情冲击与国际经济秩序的调整与改革

大约2019年底至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以蔓延性传染的方式,向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蔓延,形成了对全球经济的蔓延性冲击。疫情所到之处,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经济联系和消费被迫中断,产生了经济突然停顿下来的状态(lockdown)。2020年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的增长率为1.5%;主要发达国家的增长率都在-2.5%以下。2020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其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中,描绘了一幅2020年经济增长和失业的可怕景象,并表示“大封锁”在世界上从未发生过,其后果很难预测。报告指出:“今年全球经济很可能经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其严重程度要超过十年前的全球金融危机。”预计全球经济将萎缩3.0%,比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收缩幅度更大。发达国家的增长情况将更糟,到2020年发达国家经济整体将至少下降6.1%。其中,美国为-5.9%、日本为-5.2%、英国为-6.5%、德国为-7.0%、法国为-7.2%、意大利为-9.1%和西班牙-8.0%^[2]。6月8日,世界银行发布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对2020年世界经济给出了悲观的预测^[3]。报告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对世界经济产生快速而巨大的冲击,疫情防控措施的实施使各国经济停摆,世界经济陷入重收缩状态。世界银行估算,2020年全球经济将下滑5.2%。世界经济陷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深度衰退之中,这是自1870年以来首次有如此之多国家的人均产出同时下降。

严重的经济衰退打乱了世界经济运行的秩序,各国先是以“自扫门前雪”态度,优先解决自己的问题。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成为经济稳定的前提,市场经济原则被各自为政的选择所替代,国际协调被各国尽快摆脱疫情对本国经济的冲击所驱动。因此,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各国刺激宏观、维持微观经济不致垮塌的追求,代替了全球经济秩序的深入思考。目前疫情还在蔓延之中,尽管各国的政策选择可能是短期的,但是一些扭曲全球经济秩序的思考已经变成行动。

维护WTO基本贸易秩序的共识被总干事阿泽维多提前一年辞职所替代,新规则的引入被美国扬言继续推动不确定性贸易政策所替代。尽管人们力图探索区域合作暂时替代多变贸易体制的停滞状态,但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被迫停止;支付手段多元化的追求,被各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甚至是无限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所取代,以致世界在不确定性中寻求各国货币之间的购买力。美元是否能够保持自身的购买力和信誉,欧元是否朝着逐步增强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进发?人民币国际化是否能够顺利进行?对全球价值链的重新思考使得人们担心,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被区域化所替代,全球价值链的重构,进而演变成“区域价值链”的可能性大大增强,从而各国有可能将重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兴趣转向建立新的区域经济秩序上来,以致重回奥巴马执政时期的TPP和TTIP时代?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由于各国经济复工复产的时间不同,自然经济复苏的时间会有差异。因此,大国之间的实力竞争成为后疫情时期的主要问题。2020年5月1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我们可以与中国切断一切关系。”^[4]2020年5月20日,美国公布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5],这个战略方针与2018年宣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完全一致,将中国作为战略竞争的对手^[6]。这意味着美国与中国的贸易摩擦,以打压华为、中兴为代表的科技博弈,以严查中国在美上市企业、将300家企业和科研单位列入实体名单为标志的金融、战略产

业摩擦将是长期的。这就意味着,美国不再顾及它在世界贸易组织中所承担的公平竞争义务,不在顾忌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关约束。

总之,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性冲击使整个世界经济在严重的经济衰退威胁之下,各国政策取向出现了部分的扭曲。一些问题被搁置,一些问题被迫提出,更增加了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

四、中国的对策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性冲击之下,我们也应该看到,不确定的全球经济政策环境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全球化的总态势。

第一,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物联网为代表的第四次产业革命,将信息技术产业化,将传统产业信息化,将基础设施建设信息化,将消费扩展到信息指导,为全球产业发展、价值创造、经济全球化,包括资本全球化、贸易全球化,劳动力,特别是高技术含量劳动力的全球流动创造了广阔的空间。对企业而言,脱离这样一个产业革命的进程,与新的产业革命及其分工合作脱钩,就可能失去获取市场,获取最大限度利润的机会。因此,全面脱钩的选择是不符合资本及其获取最大限度利润动机的,因而难以实现。《华尔街日报》2020年6月15日的报道从标题到正文,对中国在中美经贸关系乃至全球贸易形势中的作用给出了罕见的积极评价——这篇以《中国是美国晦暗全球贸易形势中的亮点》为标题的报道称:“在新冠肺炎疫情限制全球贸易的背景下,中国重新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这对美国农户和其他出口商而言是少有的亮点。”^[7]长远来看中国市场非常重要,美国公司也没有停止在中国生产的计划。德国照明设备企业欧司朗表示虽然对中国市场期望降低,但是目前没有减少在华业务的计划。高盛驻东京的首席日本股票策略师凯西·松井则认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对世界上几乎所有主要经济体来说都至关重要,当经济面临巨大压力的时候,即使是那些反对中国的人也感到,他们需要中国经济来维持繁荣^[8]。《德国之声》电台网站2020年6月14日刊登题为《美企:来了,就是为了留

下》一文,文章指出:贸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特朗普“彻底切断美中关系”的威胁迄今为止都无法阻止美国企业继续寄希望于中国市场的增长。中国美国商会在疫情高峰期之后进行的一次问卷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的受访美企不愿意撤离中国市场^[9]。道理很简单,在各国急于复工复产、恢复经济发展的关键时刻,显然需要中国的市场、中国的合作。

第二,从投资的角度看,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性冲击迫使跨国公司重新思考可靠的投资场所。本次疫情冲击及其恢复过程中,中国有效的疫情防控和高效的复工复产使那些投资者得以借助中国市场弥补或抵消其他国家市场停滞带来的损失。靠谱的中国市场及其有效的管理环境成为各国的榜样。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CNBC)在2020年6月12日的报道《美国施压或加速大中国区市场增长》中指出:美国施压中国企业从美国退市将加速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资本市场的增长,因为投资者仍有意愿追寻中国市场的长期机遇。文章还引用美国金瑞基金首席投资主管布兰登·艾赫恩的话说:不让投资者投资增长迅速的公司是“一个严重错误”,将对美国金融市场产生深远影响。美国贸易谈判代表甚至明确指出:“中美脱钩不是美国的政策选项。”^[10]

第三,各国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出于政治目的所提及的看法,具有短期行为的特点。一些国家提出价值链收缩,甚至提出重组全球价值链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有自我安慰的成分。现实中,要想重建价值链需要有较长的准备期,特别是较长的调整期。因此,在疫情基本结束之后,以复工复产为特色的全球价值链重建中,经济利益仍然是起主导作用的因素。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艾伦说:“中国看起来可能会在2020年乃至2021年成为全球GDP增长的最大引擎。我们当然希望美国公司能从中受益。”^[8]从这个意义上讲,坚持对外开放,坚持国际合作仍然是我们坚定不移的选择。

当然,如果从大国战略竞争的角度出现某些局部的“脱钩”,也会给中国提供延长自身价值链的机遇,能进一步扩大本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比重

和地位。按照中国目前的战略,着眼于双循环,既积极参加全球价值链的整体循环,也时刻准备着手营建以中国产业、中国技术为主导的区域分工体系,这是中国提升在全球价值链、全球制造业中优势地位的重大机遇。

第四,尽管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了国际经济秩序构建,甚至会使全球经济秩序建设的磨合期加长,但是国际经济秩序的大方向是难以改变的。这不仅是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问题,更多的是,需要借助良好的国际经济秩序恢复和保持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国家远远多于抛弃稳定、可预见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要坚持深化经济改革,建立高水平开放的多层次平台,成为国际经济秩序的积极倡导者和模范的执行者。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要做老大,恰恰相反,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中,在改革与完善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五、结语

工业文明诞生后,经济全球化共经历了两个高潮期和两个中断期,追踪历史可以发现,逆全球化的暗流总是孕育于历次经济全球化的高潮过程中。经济全球化在创造了大量利益获得者的同时,也累积了一定的利益“受损者”,“受损者”不断积累的过程会导致经济全球化的调整乃至中断。当前,人类文明正处于第二次经济全球化的关键调整期和历史拐点,拥护全球化的广大经济体应当积极联合起来,阻止“经济全球化的不可能三角”向逆全球化的角点倾斜。

参考文献:

- [1] Stiglitz J E. Rethinking globalization in the Trump era: US-China relations [EB/OL]. (2017-10-23) [2020-06-01]. https://www.baidu.com/link?url=6-V4kj0yx5VVtheFdBgyjT5n60xwc0-DUzJJtenv8QDDbnSoVLle8NrOVUZp7oT83ZjwdsW2_g2NX-g9koK&wd=&eqid=bcd0edce00012303000000025ef99c07.
- [2]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april 2020:the great lockdown[EB/OL]. (2020-04-07) [2020-06-19].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20/04/14/weo-april-2020>.
- [3] World Bank.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EB/OL]. (2020-06-08) [2020-06-19]. <https://www.worldbank.org/en/publication/global-economic-prospects>.
- [4] Soergel A. Trump threatens to ‘cut off’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claims coronavirus proved Trump was right[EB/OL]. (2020-05-14) [2020-06-19]. <https://www.us-news.com/news/economy/articles/2020-05-14/trump-threatens-to-cut-off-relationship-with-china-claims-coronavirus-proved-trump-was-right>.
- [5] The White House.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B/OL]. (2020-05-19) [2020-06-19].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0/05/U.S.-Strategic-Approach-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Report-5.20.20.pdf>.
- [6]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EB/OL]. (2017-12-11) [2020-06-19].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 [7] Zumbrun J. China a bright spot for U. S. in gloomy global trade picture[EB/OL]. (2020-06-14) [2020-06-19]. <https://www.morningstar.com/news/dow-jones/20200614842/china-a-bright-spot-for-us-in-gloomy-global-trade-picture>.
- [8] 丁宝秀. 外媒的口风悄悄地又变了[EB/OL]. (2020-06-18) [2020-06-19]. <http://www.chinanews.com/gn/2020/06-18/9215420.shtml>.
- [9] 弗兰克·泽林. 美企:来了,是要留下[EB/OL]. (2020-06-14) [2020-06-19]. <https://cn.chinadaily.com.cn/a/202006/17/WS5ee964ffa31027ab2a8d0860.html>.
- [10] Cheng E. U. S. pressure could accelerate growth for markets in greater China [EB/OL]. (2020-06-11) [2020-06-19]. <https://www.cnbc.com/2020/06/11/us-pressure-could-accelerate-growth-for-markets-in-greater-china.html>.